

德何以立：论民国新闻记者职业道德实践的困境与振拔

路鹏程

（华东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上海 200241）

【摘要】继承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借鉴西方现代职业道德，民国新闻业形成一种个人品性新闻职业道德。这种职业道德对记者品性提出极为高远严格的要求，甚至将记者个人品性优劣当作评判其新闻道德与职业活动高下的标尺，充满了泛道德主义以及儒家传统道德精神的色彩。但是，记者的道德实践是个人意志在工作情景、新闻惯习、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的互动结构中动态抉择的结果。新闻理念上的道德绝对主义与新闻实践中的道德相对主义，使记者在面对道德困境时虽然有清晰的衡量标准，但没有切实的实现手段，在权衡与抉择的过程中充满矛盾，引发普遍的焦虑。

【关键词】新闻伦理；个人品性新闻职业道德；知名记者

【中图分类号】G210.9

【文献标识码】A

在民国，做记者注定是个令人痛苦的职业。

起居不时、饮食靡定、行止无常，日日夜夜在截稿压力下奋笔疾书对记者来说只是身体劳苦而已，而让记者始终挥之不去精神痛苦，则是其职业道德理念与实践之间永远无法弥合的矛盾和冲突。

以往研究民国记者新闻道德失范问题：一则集中讨论北洋时期北京皇城脚下专靠政治津贴营生的各类以记者名号招摇撞骗的投机分子；二则主要批评二三十年代上海黄浦滩头热衷散播黄色新闻、敲人竹杠的市井小报记者。践行新闻道德主要依靠自律。记者对新闻道德内化越浅，新闻道德的约束力就越弱；对新闻道德内化越深，越会严格恪守新闻道德。上述京沪两类记者原本就是以报纸为狗苟蝇营之工具，谈不上什么职业认同。衡以知识精英和知名记者通过集体智慧和艰辛实践日积月累建立起来的新闻职业道德规范，自然不堪。精英记者或者说知名记者将新闻视为崇高的志趣，他们对新闻道德的内化远高于一般记者，因此精英记者的道德失范问题不仅异常复杂而微妙，而且也蕴含着丰富的时代意义和重要的学术价值。^[1]

【作者简介】路鹏程，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新闻学系副教授。

一、民国新闻记者职业道德理念的内涵及特征

继承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借鉴西方现代职业道德，民国的学者和记者针对中国新闻实践提出极富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新闻职业道德。除了要求报道客观，言论公正，避免歪曲、压制、偏见，以及禁止侵犯隐私等中西新闻记者共同遵守的职业操守之外，民国新闻职业道德与西方新闻职业道德不同的是，特别强调记者个人的品性，将记者的品性标举为新闻职业道德的基干和旨归，形成一种个人品性新闻职业道德，即黄远生所谓：“提倡神圣职业，提倡人格主义”（黄远生，2013：58-68）。这种个人品性新闻职业道德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内涵极广。邵飘萍在1923年出版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中指出：“外交记者精神上之要素，以品性为第一。所谓品性者，乃包含人格、操守、侠义、勇敢、诚实、勤勉，忍耐及种种新闻记者应守之道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此外交记者之训练修养所最不可缺者。”（邵飘萍，2008：18）1932年，胡政之在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新闻讨论周中发表文章，也强调“新闻记者运用这个公器，是需要勇敢，智慧，果决，明敏，谦逊，自制。要有为社会服务的精神，不但不可借以求利，并且不可用以猎名。”（胡政之，1938：8-11）邵飘萍、胡政之等民国著名记者对记者品性的界定内涵极为丰富，包括记者的能力、气质、性格、志趣、体魄等各个方面。这个界定超出了现代职业道德基本内容和具体规范，将人的认知与心理、智力与能力都纳入到道德判断的范畴，充满了儒家泛道德主义的色彩。（二）标准极高。前述邵氏和胡氏提出的记者品性不仅涵盖了中国传统儒家士大夫的所有美德，而且也包括急公好义、杀身成仁的侠义精神，甚至还闪烁着悲天悯人、普度众生的佛家情怀。这与其说是对新闻记者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不如说是界定一个道德完人的崇高标准。“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2]，仅就这个民国记者界定品性时引述最多的观点而言，“不为利动，不为名摇，不为死惧的人才能在必要时牺牲自我的一切以求实现道德理想。有而且只有这种格调的人才能撑危局，当大任，旋转乾坤，为开创新时代而奋进”（殷海光，2002：522），这是古代大丈夫顶天立地的精神，这是现代知识分子完美人格的气概，亦远远超出了记者新闻道德实践的具体要求和一般标准。（三）践履极严。民国知名新闻学者任白涛指出，“新闻记者之理想，当沐化于美善二字之域，决不许稍涉黑暗齷齪之乡。其步履偶一失足，即由九天而坠九渊”（任白涛，1922：15）。记者品性是种独断的绝对律令，没有回旋宽容的余地，只有念念在兹，让生命中每个时刻都充满道德光芒，一念向善，道德瞬间崩溃。所以，知名记者陈博生要求“新闻记者责己要格外严，律己要格外密。丝毫不苟，丝毫不乱，才配做新闻记者”（陈博生，1938：12-13）。（四）境界极远。职业道德具体而明确，有一套众所遵从的行为守则和实践标准，但是记者品性的锤炼是无穷无尽的：品性砥砺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贯穿记者生命之始终；品性提升也不是一达即

止的，而是永无止尽的努力和奋斗，永无止境的超越和升华。（五）成为界定记者职业身份的基准。不像医学、工程、法律、财会等专业，记者这个职业似乎不具有什么将其与一般知识分子区别开来的特殊技术属性和专业壁垒。如张季鸾说，只要一个普通的师范院校毕业，文章写得比较好，就可以做新闻记者（顾执中，1987：337）。如果说记者具有什么与其他知识性职业和知识分子区别开来的独特专业属性的话，那就是记者的品性和新闻职业道德。正像任白涛所指出的，“要之，欲为新闻记者，须积得多量之知识，尤不可无相当之修养。即纵具有渊博之学问，而无忧乐天下之抱负与毅力者，则新闻事业，终不许其从事，即从事，亦难告厥成功也”（任白涛，1922：16）。在这里，品性道德成为职业的本体，知识技能只是职业的工具。倘若徒具新闻知识技能，缺乏品性道德，记者无法实现其在现代社会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发挥的社会功能，从而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所以，陈博生强调“做新闻记者的第一个原则，是要修养人格的”（陈博生，1938：12-13）。张季鸾则进一步将其上升为“新闻记者根本的根本”（张季鸾，1938：1-7）。戈公振把其树立为新闻教育的根本宗旨，“新闻学的主要目的，不是使人学得实用的职业，是给他一种精神上的立脚点，指明他能够站在应该站的地方”（戈公振，2010：9-15）。

西方新闻记者职业道德的核心是建立在新闻实践之上的一套实务规范体系^[3]（蒋荫恩，1935：35-55），尽管其也强调记者高尚的品性，但是其所要求的记者品性并不超过社会公德的一般诉求。如1920—1930年代在美国报业最具影响力的美国报纸主编协会《新闻规约》只要求记者忠于公众利益，不违反公共利益（利昂·纳尔逊·弗林特，2005：363-365）。美国著名记者和新闻教育家弗林特在1925年出版的新闻伦理学专著《报纸的良知》一书中也指出，“如果报刊能像普通人一样努力做到最好，它也就是尽了本分”（利昂·纳尔逊·弗林特，2005：5）。而民国新闻记者职业道德则将这套实务规范体系涵摄在记者个人品性之下，并对记者品性提出极为高远严格的要求，甚至将记者个人品性优劣当作评判其新闻道德与职业活动高下的标尺，即将职业操守完全融入人生境界，充满了泛道德主义以及儒家心学的道德色彩。这套新闻职业道德规范不仅既形塑着记者个人的新闻道德理念，又形成了记者群体对新闻道德的一般观念，并且随着其在社会的广泛传播，也影响着社会公众对记者职业道德实践的期待和评价。

二、民国新闻记者职业道德实践的困境及表现

（一）规范冲突：新闻采访的职业道德困境

这种高尚而严格的个人品性新闻职业道德为记者工作实践提供了伦理指南，但是，在实践中光靠这种仁慈义侠的精神是采集不到新闻的。邵飘萍提出这些新闻道德后，又

不得不在实践中否定之，“至新闻记者活动之手段，交际不能纯以道德为标准”（邵飘萍，2008：115）。更兼之，“我国尚为特殊之社会，则适用于探究新闻，亦不可以无特殊之方法”（邵飘萍，2008：214）。为采访新闻，记者有时不得不使用道德模糊，有道德争议，甚至不道德的采访方法。特别是独家消息，恰如萧乾所说，“正因为这种消息不那么容易得到，所以它往往是通过不正常——甚至不正当的手段弄到手的”（萧乾，2010：42-47）。

记者隐瞒职业身份采访新闻。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是犯罪和警务新闻的重要来源，但是巡捕房一向不对外透漏消息，拒绝接受记者采访。《新闻报》知名记者顾执中因为曾担任过巡捕房西捕的中文教师，所以他常到巡捕房与西捕寒暄闲谈，等事主前来报警或者巡警汇报工作时，他就仔细窃听，暗记心头，“这就是我们所要找寻的新闻，在外表上我们好像悠然若无其事”（顾执中，1987：185-186）。以‘诚’字为职业生涯信条的范长江于1936年赴西北地区考察时，为采访到内蒙额济纳郡王，假扮“代表某公司，向王爷送礼”，方始成功（方蒙，1989：104；范长江，2001：414）。这种隐瞒身份的采访方法甚至还被写入新闻教科书，成为新闻采访的通用技能：“有时又只能作为私人询问，而勿令知我为新闻记者。”（邵飘萍，2008：51）此外，记者还常常将朋友私下晤谈的重要内幕作为新闻公开发表。特别是在欢宴应酬，杯酒交欢之时，消息来源酒酣耳热，忘乎所以，无话不说时，记者悄悄记下重大内幕新闻。邵飘萍最擅长此道，他回忆称，“某次在北京饭店宴全体阁员、府院秘书长等，各人兴致勃勃然，无所避忌，吐露甚多重要之消息。愚预备电报纸于隔室，令两脚踏车守候门外，随得随发，宴会未终，而各种重要消息已达于上海”（邵飘萍，2008：19）。

记者趁人不备窃取新闻资料。陈果夫大骂“你们这班不道德的新闻记者”，就是因为他办公室的一份秘密文件不见了，翌日刊布在《新闻报》上，他以为是该报记者顾执中偷取发表（金雄白，1988：217；顾执中，1987：293）。尽管此事出于陈氏的误会，但是可见窃取新闻资料为一般社会道德所不容。可是，确实有记者为之，如为人任性，做事冲动的金雄白。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后，《时报》记者金雄白在采访上海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处长陈群时无意得知，他们已经秘密捕杀了沪杭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和宣中华，金雄白假装糊涂，佯装不知两人姓甚名谁。陈群写下两人的名字，拿给金雄白一看之后，立即把那纸条团皱投入废纸篓。金雄白则伺机偷偷从废纸篓中捡出那张纸条，藏进口袋，带回报馆。第二天《时报》刊登了汪寿华和宣中华被害的消息，并将陈群亲笔写的那张纸条一起制版刊出（金雄白，1988：195-196）。^[4]

记者通过贿赂来获得采访机会。当重大新闻发生时，权势人物为封锁消息，拒见记者，而记者则不惜重金贿赂，打通关节，以图接洽。在推翻张勋复辟之际，邵飘萍去采访以“再造民国、功盖当世”自居的段祺瑞时，遭到警卫挡驾。邵飘萍给了卫队长一千

元的巨额小费，得以获见段氏（宋北风，1983：95-97）。即使深受美国新闻职业道德洗礼的董显光于1925年在苏联大使馆请求采访鲍罗廷被拒之后，也是通过给使馆门卫“一叠足够使他感到意外的钞票”，秘密问出鲍罗廷的居所，最终如愿以偿（董显光，2014：73-74）。甚至上海大报定期给政府机要人员提供津贴，俾其供给未经公布的紧要新闻，或给予该报记者采访便利。记者们认为“此种秘密费用，在新闻采访工作中也是不可少的”（王文彬，1938：79）。

记者经常将相互竞争、彼此敌对的消息来源的重要情报泄露给对方以换取信任和新闻。黎民任把桂系密图拘禁汪精卫的消息透露给金雄白，并坚嘱“事关重大，你却千万不可泄露”，但金雄白出门之后，即立刻驱车转告汪的亲信曾仲鸣。汪精卫连夜离沪赴法。桂系计划落空，金雄白却凭此与曾仲鸣之间建立起更为紧密的关系（金雄白，1988：99-101）。

记者有时在嫖赌之中获取新闻。特别是北洋时期，多数军阀政客，非风流成性，即嗜赌成风，甚或狂嫖滥赌兼而有之。面对此情此景，邵飘萍无奈地指出，“我国污浊之社会中，往往以嫖赌为所谓应酬之要件，外交记者欲与各方周旋，似此种机会亦不能绝对不与”（邵飘萍，2008：25）。不独邵飘萍好冶游，逛胡同、开赌局，是家常便饭（包天笑，2009：525），许多知名记者都是与消息来源在声色之场觥筹交错之中攀上关系，加深感情，探访秘闻。如湖南军政要人每晚都在长沙的俱乐部里吃喝嫖赌，百无禁忌，时任《新闻报》驻湘记者陶菊隐“也经常前去鬼混”，因为那里可以听到许多内幕新闻（陶菊隐，2005：36）。尽管南京政府成立后严厉扼制军界官场的嫖赌之风，但遗风流韵不绝如缕。金雄白赴北京出差采访之时，几乎每天晚上都是陪周佛海、陈布雷等流连在清吟小班的闺房妆阁之中（金雄白，1988：8、99）。

记者可以将社会公德弃诸脑后，通过隐瞒、欺骗、盗窃、背叛、贿赂、嫖赌等手段来采访新闻吗？具有高度品性新闻职业道德的记者会通过这些违背公德的手段来履行报道任务吗？在面临艰苦卓绝的险恶境地或生死攸关的凶险事态，当其他记者都退避三舍时，陶菊隐、顾执中、金雄白、范长江等前述这些知名记者却冒险犯难，迎难而上，甚至邵飘萍“举凡所谓穷饿、羸囚、捕逃、沦落，兄弟妻子离散，人生所不堪之楚毒，殆无不以一身受之”，最后以身殉报（汤尔和，2008：7）。这些知名记者为采访新闻不惜生命代价，又何顾惜社会公德？他们在关键时刻都创造了新闻职业道德的时代高峰，而在日常实践中却常常有悖社会公德的底线。难道真如范长江在刚踏入记者生涯时所说，“人为维持生存所采取的一切手段，从他自身看来，都是道德的”“道德或不道德的问题，并不能有‘万古如斯’的标准。这全看个人的当时当地的立场怎样”（范长江，2001：65-67）。但是，破坏公德冲击的是公众对记者信任和尊重，而新闻业的声誉和影响就建立在公众的信任和尊重之上，记者失去了公众信任和尊重就丧失了自己的

生命。公众对记者的判断不仅是其职业技能，而且更关注其实施职业技能时所表现出的道德水平。无论是高官显贵斥责“你们这班不道德的新闻记者”，还是黄包车夫在骂“干报馆的没有好人”（王芸生，1938：19-21），世人的着眼点都在记者的道德。甚至有公务员借题发挥，抨击记者缺乏社会公德，“不配奢谈言论自由”（都，1933）。记者们深知个中利害。邵飘萍反对盗窃式的新闻采访，要求采访时“决不可翻阅函件，或窃窥窃听，以免有损尊严”（邵飘萍，2008：33）。其实，邵氏自己隐瞒记者身份骗取消息来源之新闻，与顾执中、金雄白等窃听窃取新闻资料，可谓五十步笑百步。邵氏和金氏都常在嫖赌之中猎取新闻，但是邵飘萍在平民大学新闻学系讲授新闻采访时，劝告学生“此类空气污浊之交际场所，最足使身心受害，且易损及职务之尊严，既无必要，总以勿入漩涡为上策也”（邵飘萍，2008：25）。金雄白也对其记者生涯中沉溺于酒绿灯红之中追逐声色深表忏悔（金雄白，1988：8、62）。有记者也自我批评“新闻记者有时为达到得特殊新闻之目的，往往不择手段，以致丧失新闻道德，而使对方厌恶忌惮”（海士，1930）。记者一则在采访实践中难免违背公德，一则在职业理念上要求务必恪守公德，这种尖锐的价值冲突让记者倍感迷惘和困惑、焦灼和痛苦。

（二）规范失范：新闻写作的职业道德困境

记者不仅在采访新闻时经常遭遇道德困境，而且即使顺利获致消息在伏案写作新闻时也会面临道德挑战。

记者在新闻写作中违背客观公正原则。林白水观点辛辣，笔锋犀利，在新闻通讯和评论中，批评军阀、政客、议员，以及投机文人形容备至，体无完肤。他将官场比作粪坑，将官员比作群蛆；将议员喻为猪猡，林白水因此而名动一时，被誉之为“透骨见血，铁肩辣手”（方汉奇、林溪声，2006：30-32）。许多军阀政客公开的言行举止衡以社会公德本受訾议，而记者又能看到他们在幕后更为卑劣不堪的面目行径，在品性新闻职业道德这种严格道德主义的逼视之下，记者对这些军阀政客充满厌恶、鄙夷、憎恨，兼之出于对政治腐败的强烈痛恨以及对国家进步的急切希求，特别是对有些生性耿直、嫉恶如仇的记者来说，极易宣泄为对军阀政客痛彻而凌厉的口诛笔伐。但这种违背新闻出版法律的人身谩骂与人格侮辱，即使在新闻界也颇遭非议。比林白水晚一辈的记者陶菊隐说，“对于坏人坏事虽应有所揭露，但可用平铺直叙的笔调，把事实摆出来就够了，不必大张旗鼓进行人身攻击”（陶菊隐，2005：37）。他惋惜地指出林白水案即肇因于此。更年轻的一代记者陈学昭也提出，记者在报道新闻时应该“是公正客观的”，在发表评论时应该“是指摘的而不是谩骂的”。这是“一个记者如要完成他的任务，至少必须具有两个不可缺少的资格”（陈学昭，1930：13）。到20年代后期随着民国记者职业化程度的深化，知名新闻记者不大再肆无忌惮地撰写嬉笑怒骂的新闻评论，但是小报记者依然热衷于此，这导致分不清大报小报的社会民众不分青红皂白地说，干

报馆的没有好人。

记者遵从消息来源要求或请托隐瞒重大消息。当时知名记者在面对军政要人坚囑交谈内容保密时，通常都会顺其所请不发表新闻。如赵效沂说，“采访新闻的原则，要多交朋友，示人以信，该受‘约束’的，应该保持信用，宁可牺牲发表一则新闻，不可失信”（赵效沂，1981：21）。这几乎是民国记者们的共识，所以被一再写入新闻教科书，上升为新闻工作的一般专业准则（陶菊隐，2005：36；金雄白，1988：187；赵效沂，1981：21；邵飘萍，2008：24-25；王文彬，1938：3）。而新闻职业道德同时要求记者，应该“凡事必力求实际真相，以‘探究事实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邵飘萍，2008：16）。记者对于重大内幕消息保密还是泄密，是对消息来源恪守私人承诺还是忠于公众知情权利，似乎两者都有充沛的理由，前者是儒家道德传统的核心要素，后者是西方新闻道德的首要规约。这是中西合璧的民国新闻职业道德的灰色地带和记者抉择的两难困境。

记者厉行自我新闻审查，自觉回避或主动避免报道某些争议性和批评性内幕性信息。对此，邵飘萍颇为愤恨地说，“盖三百余日所堆积之污浊新闻，不能发表者殆居其半”（京报，1921）。《新闻报》驻京记者张继斋也无奈地指出，政治新闻“虽有所闻而可以布之于外者，只占几分之几”（张继斋，1923）。北洋政府时期，记者们对自我新闻审查的愤恨和无奈主要是担心得罪权势人物引火烧身，而在南京政府时期，记者又害怕违反新闻审查制度遭到严厉处罚，并且后者对记者和报界的威慑力尤为严重（林语堂，2008：142）。在这种情况下最考验记者的勇气与智慧，最需要唤起记者的勇气和智慧，但是记者却放弃了抗争的勇气和智慧，被迫无奈地屈从于自我新闻审查。自我新闻审查伤害最深的就是记者的自我品性。民国最早以新闻采写著称的记者黄远生，也最早经历了这种痛彻心扉的创伤，“夫人生之最惨，莫惨于良心之所不欲言，而以他故不能不言，良心之所急于倾吐者，而乃不得尽言，而身死或族灭乃次之”（黄远生，2013：45-48）。记者心底上对自己面对新闻审查退避三舍，三缄其口，亦引咎责躬，痛心疾首。

记者以极为隐晦的手法报道重大内幕新闻，读者读了不明所以，茫然无解。在与新闻审查斗智斗勇时，徐铸成强调，“发表到什么程度，明写、暗写，掌握适当程度、分寸、火候”，是记者必须修炼和具备的基本功（徐铸成，2011：99）。1930年春，中原大战前夕，徐铸成探得阎锡山已与冯玉祥达成和解，秘密释放软禁在晋的冯氏返陕，整顿军队联合反蒋。但此事事关重大，不便轻易报道。各家报纸每日都在连篇累牍地报道阎锡山为迷惑南京政府而释放的虚假新闻，说冯在晋安好，两人晤谈甚欢。《大公报》对此，只字未报，仅在要闻版上，以五号小字刊了一行消息：“北京电话：据太原来人谈，冯玉祥于十一日起，不见客。”徐铸成赞赏这种“‘录此存照’的手法”。他说，

“当这一新闻内幕完全揭开以后，读者一定会疑问：《大公报》固然没有刊登这些谣言，但是，为什么没有及时报道真相呢？他们一定会翻前几天的报纸，当看到这一小条新闻，会恍然明白：‘原来《大公报》不是不知道，而是认为不应该早披露的’，也就原谅了”。^[5]如果读者读不出来话外之意，只是事发之后才恍然大悟此弦外之音，这是记者在新闻报道时分寸拿捏得高明呢，还是记者在应付新闻检查和读者监督的双重压力时自我保护策略的火候掌握得巧妙呢？

记者可以为保护职业自主和独立，通过避重就轻、含糊其辞，甚至隐匿不报的方式，来报道新闻吗？这是保护还是放弃职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这种新闻报道方式符合品性新闻职业道德吗？尽管社会同情记者们“不能记而勉强记，不能批评而勉强批评，意外不幸的遭际，就要临到头上来。这是多么使得办理新闻事业者精神上感觉痛苦呀”（郭步陶，1936：123-124）。但无论是记者自身还是社会各界都反对记者自我审查。在社会大众对记者和报纸的期待之中，“该登的不登，……他的报纸一定为人看不起”（郭步陶，1936：17）。记者也自我批评说，“顾全了另一当局者的利益，将这位报纸是宝贵的消息，竟可以按下不表。他得到了若干的小惠，他就可以自甘背弃多数的读者”（袁殊，1936：51-52）。报亦忧，不报亦忧。这对那些将新闻事业作为自己生命关怀的精英记者来说，充满强烈的道德紧张与精神折磨。正如陶菊隐当时痛苦地感到：“‘政情内幕’，当局列为‘禁区’，我如避而不写，就是对报馆和读者不负责任，如如实报道，又恐引火焚身。”（陶菊隐，2005：38）

（三）规范之上：新闻职业的价值认同困境

道德困境贯穿新闻生产与传播过程之始终，特别对于政治新闻记者来说，即使新闻顺利见报，但是当新闻广为传播却无法实现其监督政府，改进政治，臻于善治的社会功能，只是印在纸上的无声呐喊之时，一种巨大而沉重的道德无力和道德焦虑在记者心头油然而生。

民国以来，翻云覆雨的军事政治剧变层出不穷。面对军阀穷兵黩武，祸国殃民，面对政客争权夺利，损公肥私，那些初出茅庐的年轻记者充满了义愤和兴奋，因为这正是他们实现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这一远大抱负的重要机遇。正如金雄白说：“一条新闻或一篇评论，可以转移一时的风气或造成一股浪潮，也许我的（投身新闻业——引者注）乐此不疲，原因即在于此。”（金雄白，1988：14）所以，记者都义愤填膺并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揭露官僚、挾伐军阀的新闻运动之中。但是，几年下来，记者“日与悲惨、恐怖、沉闷之事实相接触，亦颇觉其苦矣”（邵飘萍，1987：199）。邵飘萍当时写到许多人“偶一涉笔便觉生厌”（邵飘萍，1987：192），写到许多事“泪已枯而心滋痛”（邵飘萍，1987：281），他感到“精神痛苦实有难言”（邵飘萍，1987：290）。这不只是邵氏个人的苦楚，而是许多记者的共同痛苦。明知政治局势日益腐

朽，文人论政无法清明政治；明知军阀政客利欲熏心，新闻言论无力警醒冥顽。“观于国家之现象，财政如此！外交如此！军事如此！而观于立法、行政两部，则犹是醉死梦生；观于各派、各党之内幕，则犹是倾轧成风。试问何事有何办法，何事可解决耶？怅望前途，隐忧曷极”（邵飘萍，1987：128）。北洋军阀时代，尽管武人当权恣肆无忌，文人论政空自嗟叹，但记者至少可以揭露政府黑幕，自由批评政治，待到南京政府成立，除颁颁严刑峻法强化新闻审查之外，还诉诸人身迫害、特务暗杀等极端暴力手段厉行新闻统制，许多记者和报纸三缄其口，谈都不敢谈政治。

品性新闻道德的终极关怀不仅仅是达到崇高的品性，成为道德的完人，也不仅仅是新闻至上，挖掘和报道事实真相，而是通过饱含严格道德主义的新闻报道推动政清人和，实现国富民强。所以，当记者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自我期待被政治宰制碾得粉碎，只能寄情山水做文字游戏之时，报业安身立命的社会意义是什么，记者孜孜以求的崇高品性的根本价值在哪里？这是一个在一般新闻职业道德范畴和道德推理的有效性之中难以确证，甚至从不触及的元伦理难题（罗彬，2009），但这又是一个在威权时代，记者不得不面对的职业道德之上的道德困境。对此，有的记者采取明知不可而为之的英雄主义，“愚为尽其责任起见，明知无益，不得不试其一鸣”（邵飘萍，1987：278）。有的记者标举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在无论什么人都不顾‘道德’的今日，要新闻记者去顾全道德，原是不可能，抑且也是多余的事”（芳，1937）。有的记者采取犬儒主义，于游戏笔墨嬉笑怒骂之中一吐其满腔的牢骚与抑郁。也有记者采取悲观主义的态度，“一个报人到了不能说话的时候，自然心灰意懒，什么也不想做了”（鲁莽，1943：56），或暂时脱离新闻采访工作退居二线，或“逍遥报外”，或彻底告别报人生涯。无论记者采取何种主张和态度都深刻地揭示出，当职业道德被权势力量碾压粉碎后，当品性只能独善其身，不能兼济天下之时，在记者内心深处烫灼之下陷入无尽苦闷和无限沮丧。

（四）规范交织：记者职业道德和个人私德畛域混同的困境

尽管职业道德和私人道德不能混为一谈，但是亦无法绝然两分，视同秦越。记者的生活方式不仅影响着其职业道德，而且也影响着社会大众对记者职业道德的期待和判断，何况新闻职业道德原本就是记者的积极思考和公众的集体智慧互动之产物。

邵飘萍提倡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但不反对记者富贵，他自己就享用豪奢，生活奢侈。而邵飘萍经营的新闻事业皆是名重利薄，常为经费所困（邵飘萍，2008：84），为维持报业生计，为保持体面生活，他难免收受津贴贿赂（林熙，1997：105）。

与邵飘萍同样才华横溢，又同样不幸以身殉报的林白水，就两者奢华的生活方式而言也极为相似。林白水的住所有三四十间房子、四五个院子，林白水的女儿林慰君回

忆说：“我们家佣人最多时，整整有十个。厨房里两个厨子，一个大厨子，一个帮厨。门房有一个看门的，两个听差——一个管收拾父亲的客厅，书房，客房等等，一个管研墨，上街买东西，扫院子等等。女佣人经常有三个。一个管伺候母亲，另外一个管‘打杂’洗衣服，做针线活等等——还有一个专看着我。此外还有一个车夫，一个花匠和一位‘护院的’。”（林慰君，1969：49）而林白水办的报纸也是叫好不叫座，所以，“他的债务永远还不清”（林慰君，1969：50），从而陷入对批评对象“不择手段的要素”（徐铸成，2010：90）。

曾与林白水在《新社会报》共事的胡政之，对林氏的作风做派颇为不满，但依然难以做到贫贱不能移。北洋时期李思浩掌管财政部的几年间，每月送胡政之三四万元，从未间断过（林熙，1997：105）。

那些跨越晚清民国，饱受旧文化熏染的知名记者大多秉承了传统名士既粪土金钱，又挥金如土，豪爽不羁的气习，认为接受津贴“这种不劳而获的干薪，是有力报人所应享受的一种特权”（王新命，2016：271）。对于民初记者接受津贴的现象，部分记者感情上表示同情，如民国知名记者曹聚仁追忆说，对于“上一代的报人的评价，只能看他们在新闻工作上的成就如何，至于他们拿钱不拿钱，那就等于怪赛金花不替洪状元守节了”（曹聚仁，2007：333-334）。但越来越多的记者理智上予以反对。如任白涛批评说，记者接受津贴贿赂“此种怪状，纵从法律上幸免构成其罪名，而于道德审判之前，则不容赦，所谓良心之制裁是也”（任白涛，1922：16）。

1920年代末至1930年初，伴随着当时政治秩序渐趋稳定，经济日渐繁荣，交通日益改善，教育日趋普及，中国报刊从个人式的新闻业逐步演进为机构式的新闻业，报馆经济实力日渐雄厚，记者工资待遇稳固提高，军阀政客大规模贿赂记者，记者以政治津贴赖以生现象大为收敛。^[6]

此时，记者的个人道德问题主要从津贴贿赂、生活奢华转向生活风流。做记者的人不仅大多对循规蹈矩的工作内容、按部就班的工作模式不感兴趣，而且也有不少新闻记者不安于温馨和睦、富足安逸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他们的血液里总是涌动着强烈欲望，渴望一种充满刺激的生活。有的记者出入花丛、走马章台是为采访新闻而逢场作戏，而有的记者在灯红酒绿中则沉溺于寻欢作乐，纵情荒嬉。赵叔雍、金雄白即使在调查“济南惨案”之余，都不忘做狎邪之游（金雄白，1988：224-225）。《申报》知名记者金华亭好色好赌，“一看到漂亮女子，就什么都不管”，一打起牌，任何重要的采访工作都弃之不顾（顾执中，1985：23；1987：290）。顾执中不赌不嫖，但“在男女问题上，走了错综复杂的道路”，与妻子分居，和唐氏同居，与此同时还与张女士、沈女士谈情说爱，一度 and 卢女士打得火热已到谈婚论嫁的地步，最后结婚却是比他小14岁的欧阳恺丽，至此顾执中的感情和婚姻状况才稳定下来（顾执中，1987：77-78、135、

228-230、283-287、377-380)。张謇批评《时报》说，“时报馆冷血好赌，天笑好嫖，哪里办得好？”（包天笑，2009：410）暂且不论张謇对陈景韩和包天笑的批评是否属实，但其代表了士绅阶层对记者道德的普遍期许和基本评判。金雄白初入社会时，他母亲就告诫他不嫖、不赌与不抽鸦片。这不仅是一个母亲对爱子的殷切嘱咐，亦代表了当时民间社会道德风气所尚。即使记者自己回顾往事，亦满怀自责自忏。多年后，金雄白深为感叹：“说来惭愧，半世纪来，我真能恪遵慈训的只有不抽鸦片一端而已。”（金雄白，1988：62）顾执中回念前尘亦追悔“在私生活问题上走上了错误的道路”（顾执中，1987：228-230）。

生活奢华、生性风流恐怕是传统士子向现代职业人士过渡时期的流风遗韵，但这种生活方式不仅在传统旧道德中原本就充满争议，更是五四新道德猛烈攻击的封建余孽，衡之以个人品性新闻职业道德的高标准和严要求，就显得分外不合时宜。

三、民国新闻记者职业道德实践困境的原因

记者的道德实践是个人的抉择，但又不是完全由个人所决定的。它是个人意志在情景、惯习、文化和制度的互动结构中动态抉择的结果，并且贯穿于记者琐碎而又漫长的日常工作实践之中。

一般人陷入道德困境，可以苦思冥想，反复斟酌，但是记者遭遇的道德考验，多在局势复杂，信息模糊，情况紧急之际，甚至有时是在极度混乱和危急的情况下，记者既无法明确判断消息来源和报道现场的实际情况，也不容其再三思量，必须迅速做出决断。即使资深记者对此也倍感棘手，如陈博生说，“新闻记者繁忙工作之中，必须保持冷静的头脑，周密的思考，才能有公正的判断，合理的批评。我个人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新闻记者的生涯，始终还没有做到这一点”（陈博生，1938：12-13）。记者仓促间实施的道德实践，有时与职业道德理念仅一步之遥，有时相距河汉。当记者无论是事后蓦然回首还是冥思苦想这个道德抉择，有的让他懊恼一时，有的使他遗恨终身。对此，陈博生感叹道，“修养功夫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陈博生，1938：12-13）。

任何工作都会遇到与职业实践、职业荣誉甚至和生命有关的道德困境，但很少有职业像新闻记者一样在新闻生产整个流程的各个环节中都会直面猝不及防的尖锐道德难题，以及防不胜防的隐蔽道德陷阱。一个道德上的郁结刚解，马上又遭逢另一个新的道德冲突。虽然有时是强烈的道德张力，有时是缓慢的道德纠结，但是道德困境的煎熬和磨蚀贯穿记者职业生涯始终。最棘手的是，新闻职业活动本身包含着道德模糊性和道德矛盾性，即理念上的道德绝对主义与实践中的道德相对主义，这使记者在面对道德困境时虽然有清晰的衡量标准，但没有切实的实现手段，在权衡与抉择的过程中或充满矛盾，或隐含风险，难免引发焦虑，带来痛苦。

复杂的社会特性又不断再生产着新闻职业活动自身的道德矛盾性，并且将这种矛盾嵌入其他更加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之中使其进步激化和恶化。新闻道德只有在政治自由民主、经济繁荣稳定、文化理性宽容以及职业自主独立的情况下，才能得以广泛落实和彻底贯彻。民国时期不仅根本不具备这些条件，而且恰得其反。似乎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时代的新闻记者，像民国前期的新闻记者一样在二三十年的职业生涯中遭遇无数的政治腐败、社会动荡、战争冲突、灾害灾难，并且由于当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和刺激，这些天灾人祸造成的社会恶果和心理创伤被加倍放大。在这种险恶的社会环境中，各种形形色色的权势集团和力量都千方百计威逼利诱新闻记者以满足一己之私欲，所以，在记者周围，不仅记者本人感到“种种利欲之诱惑，环伺于左右，稍有疏虞，一失足成千古恨矣”（邵飘萍，2008：18）；时人冷眼旁观也为新闻记者的生存环境满怀忧虑，“今之国中，不啻危机四伏，抑且陷阱满前。新闻家之地位，乃日在万丈悬崖之巅驰其摩托，与此堕入九幽之鬼友，目挑心招，以得其所谓材料者”（汤和尔，2008：7）。亲历和深谙个中艰辛的张竹平感慨万千：“我常看到许多能以很有成就，或很有希望的从事新闻事业的人，每每因为易受多方面的诱惑，结果使他们的意志不能坚定。甚而忘记了新闻事业的伟大，抛弃了自己所负重大的责任。这是多么可以令人痛惜呵！”（张竹平，1934：1-2）邵飘萍苦口婆心地劝告同仁和后辈：“惟外交记者之地位尤易流于堕落，愚故不惜以阅历所得，再三郑重为有志诸君告也。”（邵飘萍，2008：18）

民国以来，又是中国现代历史上道德转型最剧烈的时期，旧道德衰而未倒，新道德建而未立，由于社会缺乏道德共识，结果导致各种道德观念都大行其道，并且各是其是，各非其所非，百家争鸣，莫衷一是（唐德刚，2012：87）。面对各种不同道德标准，不知何是何非，面对急遽变化的道德标准，不知何去何从。身处此中，即使坚守一种道德也会左右不是，前后失据，在这前后左右、来回往复的矛盾之中，理无所依，心无所安，满是焦灼和苦闷。社会陷入道德相对主义的时代，与社会各界、各阶层都交往频繁、利害攸关的新闻记者及其职业道德更易备受攻击，四面受敌，所以金雄白当时才会哀叹，“报纸本为是非最多之地，记者又为恩怨最多之人”（金雄白，1988：14）。不仅高官显贵斥责，你们这班不道德的新闻记者，而且黄包车夫也在骂干报馆的没有好人。这让民国知名记者王新命，“有一个时期，我为了新闻记者究竟是上帝还是魔鬼，发生异常惶惑不安的情绪”（王新命，2016：24）。

在这样的时代，从事这个职业，必然让记者陷入道德的困境。在崇高的品性新闻职业道德面前，所有的记者都有失落感、卑微感、愧疚感，越是精英记者，感觉越强烈，自责越深刻。反求诸己，尽在自己，作为精英新闻记者，职业道德实践总可以更纯粹，更高尚，总有进一步提高的可能，从不会对自己既有成就感到安心与满足，虽不断超越自我但从不会达到自我追求的终极目标，以致从业十多年的王芸生都“觉得我自己还不

配做一个新闻记者。”（王芸生，1938：19-21）另则，人性中本有阴暗的一面，刨根究底追问自己的心灵阴影和精神隐私，都会发现自己内心隐藏着多少狭隘、自私、卑劣的动机和情感，而在品性新闻职业道德的拷问之下，自我追问越深越痛苦。黄远生从学理层面公开忏悔其内心理性与欲望的挣扎，“理不胜欲，故以堕落；欲又不能胜理，故以苦痛。越苦痛则越堕落，越堕落则越苦痛，二者循环相生，扰扰不绝，遂令一生非驴非马，既不能为真小人，亦不能为真君子”（黄远生，2013：58-68）。徐铸成多年后被迫从现实活动层面检讨其内心的幽隐，在民国做了二十二年的记者，“受尽了倾轧排挤，也学会了一套自卫和排斥别人的本领”（徐铸成，2012：6）。

四、民国新闻记者职业道德实践困境的振拔

尽管民国时期，报界和社会合作通过改善经济收入，提供组织援助，实行业务监督，开展学术研究、加强专业教育等各种途径和方法来提升新闻记者职业道德，特别是在本研究时限之中，新闻记者的具体实践道德准则变得越来越细致和全面，但始终没有改变的是，将记者的品性标举为新闻职业道德的脊梁和灵魂，将提升记者职业道德的根本方法诉诸于自己品性的磨砺和锤炼。这种具有强烈儒家心学色彩的品性职业道德不仅笃信人心本善，而且坚信人心本身就具有建设高尚品性的深沉潜力和强大力量，只要提振、充实、发扬良知良能，就能臻至道德完善^[7]，成为“一个有灵魂的新闻记者”。对民国初年黄远生这一代新闻记者来说，现代新闻职业道德尚在萌芽之际，他们常常直接引述儒家心学思想以表达从业心志和职业伦理，“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又曰：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又曰：我无他，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又曰：其自反而缩者，虽千万人吾往。一国中之赖有志士仁人者，赖有此耳！”（黄远生，2013：45-49）即使被誉为民国报业一代宗师的张季鸾于1930年在给燕京新闻学子讲授新闻道德时，不再大段大段引述儒家经典，但是其不假外物，反向自心，强调立志的做法，依然体现出的是儒家心学本色：“我想要作记者的人们，一定应该先有这一种志气，有这种志气，所以不怕危险穷困劳苦，所以甚兴趣，所以才能当作职业干。同时有这种志气，一定成好记者，事业一定成功！”（张季鸾，1938：1-7）正是在品性职业道德思想激发之下，记者热切地向往新闻职业道德理念的高尚性和纯粹性，即使在实践中深刻地体历到职业道德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也不会让记者感到品性职业道德是绝望的希望，是空想的理想，是永远无法抵达的终点^[8]，因为在儒家心学的观念中，品性就是在重重磨砺、层层考验中不断反省，不断提高，不断完善。在此过程中，记者当然要付出代价，虽然不是每个记者都像邵飘萍一样，举凡所谓穷饿、羈囚、捕逃、沦落，兄弟妻子离散，人生所不堪之楚毒，殆无不以一身受之，但都曾几经风吹雨打，在世事磨炼下，在精神锤炼中，实现道德升华。尽管，即使体历了这种品性的锤炼和提升其实也无法帮助记者找到解决职

业道德困境的终南捷径，但是，这些可以使记者更加深刻和细腻地理解职业道德内涵，可以使记者更富勇气和智慧地去面对职业道德困难。至为关键的是，面对艰苦卓绝的险恶境地或生死攸关的凶险事态，只有这种品性新闻职业道德才能激励记者意志，使他们的信念战胜利害，价值理性压倒实用理性，奋不顾身，迎难而上，追问真实、挖掘真相。所以，对于年轻的记者鲁莽（1943：2）来说，“林白水、邵飘萍等事件，只有增加我对记者生活的神往，毫不使我惧怕”（鲁莽，1943：2）。而对于“西安事变”之际的范长江来说，新闻记者的责任是为公众及时、详细、公正地报道新闻，如果因此“万一有什么不幸的话，也是做记者的职务上所应当”，随即只身飞往凶险难测的兰州（范长江，2001：512）。

在经历了职业道德困境的强烈煎熬之后，在经历一番痛彻心扉的内心挣扎和精神斗争之中，记者才能更加欣悦、更加深沉地体味高尚职业道德和出色职业成就的价值和意义，记者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新闻事业之于自由民主、繁荣富强的价值和意义，并在潜移默化中将其升华为人生的根本价值和最高追求。顾执中回顾其记者生涯时自豪地宣称，做出杰出成就的新闻记者“脍炙人口，垂名宇宙，比国之居高位的政治家更受人尊敬。他们的地位不是金钱和权势决定的，而是他们的忠心耿耿，努力地为人民为祖国为党的革命事业作出崇高的贡献决定的”（顾执中，1985：39）。没有经历过坎坷、困顿、挫败的职业道德磨炼，是不会真诚地赋予，也无法真挚地领悟到新闻工作如此高尚的价值和意义。这时，王新命恍然大悟：“一样是人，但有上帝和魔鬼之分，新闻记者亦然，要做上帝，自然就成为上帝，要做魔鬼，自然就成为魔鬼。”（王新命，2016：25）

注释：

- [1] 本文讨论时限是从1912年民国建立后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因为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记者职业道德呈现出显著变化，这有待另文专论。
- [2] 除前述邵飘萍和胡政之的观点外，引述或部分引述这个说法的文章还有，任白涛.应用新闻学[M].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三联书店复制版2014年版，第15页；伍超.新闻学大纲[M].商务印书馆，1925，第49页；何西亚.今后的报纸和记者[J].大上海人，第39-41页。王芸生.努力做一个有灵魂的新闻记者[A].载王文彬编.报人之路[C].三江书店，1938年版，第19-21页。表达了类似说法的文章有：“所谓千金不能易其格，威武不足动于中者，始可达到其神圣之任务，保存其无上之价值。”凉.新闻纸之任务与新闻记者之道德[J].前进半月刊，第2-3页，等等。此外，还可见记者私下的谈话，1935年尚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的范长江拜访胡政之，提出采访中国西北角的计划，胡政之极为赞赏，立刻礼聘其为特派通讯员，并语重心长地教导范长江，只要“不求利、不贪名，诚实甘愿做社会无名公仆，迟早是有效果的”。（见方蒙.范长江传[M].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第104页。）成舍我常对青年讲，报人最伟大而崇高的精神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标准报人”（见成舍我.代序.载王新命.走过民国初年的新闻史：老报人王新命回忆录[M].台湾独立作家，2016，第7-9页。）王新命父亲与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亦可参见前书第38页。此类说法，不胜枚举。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在民国时期具有儒家心学色彩的品性新闻职业道德理念可能比以威廉博士《新闻记者信条》为代表的英美新闻职业道德理念更具有影响力。引述和尊崇后者的记者群体主要集中在“密苏里帮”以及毕业于深受“密苏里模式”影响的国内新闻院系的学院派记者群体之中，而引述后者的记者群体即涉及前述记者群体，还包括更为广泛、更为多元，甚至更具影响力的记者群体。所以，即使“密苏里帮”的

马星野也是以儒家心性色彩的品性新闻职业道德理念为“体”，以英美新闻职业道德理念为“用”，中西合璧，撰写出《中国新闻记者信条》（相关详细讨论参见王继先、马星野的“三民主义新闻思想”略论[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9期，第114-125页）。更重要的是，恰如魏舒歌所指出的“美国传入的新闻专业化理念、标准和技术虽能使国人掌握对话的技巧，但技巧之下更深层的中国精英的处世理念和内敛型文化传统，则如磐石一般难以撼动”（见魏舒歌著、魏舒歌、李松蕾、龙伟译。《战场之外：租界英文报刊与中国的国际宣传（1928-1941）》[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第255-256页）。这一观念亦可用来阐释中国记者对中西新闻职业道德认知的差异和认同的深浅。当然，这个问题极为复杂，笔者这里只能略谈一二，如果要对其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检视，则有待另文专论。

- [3] 有关英美新闻职业道德理念在民国传播的讨论可参见，邓绍根。百年回望：美国新闻记者信条在华传播及其影响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10)，第11-27页。
- [4] 查阅《时报》未发现金雄白所说的这篇报道。《时报》涉及宣中华的新闻只有一篇《杭州公安局之通缉令》（1927年4月17日），报道杭州公安局通缉宣中华，但其实4月14日宣中华已被龙华警备司令部逮捕，并且就是在刊发此则新闻那天的深夜被杨虎杀害。
- [5] 徐铸成回忆稍有差错，查《大公报》的报道是：十日上午十一时发太原专电，此间各干部要人，鱼（六日）阳（七日）齐（八日）俱有重要会议。冯自返并，除表示一切与阎一致外，避谈时事，青（九日）起，谢绝宾客，凡往傅公祠进谒者均未得见。此间连日关于阎冯出洋之声浪转微。（《大公报》1930年3月11日）首先，《大公报》在形式上，标明其是发自太原的专电显示了此则新闻的重要性和可信性；其次，在内容上，“谢绝宾客，凡往傅公祠进谒者均未得见”，有两种可能，一冯在，拒见客，二冯不在，客未得见；而后一句“连日关于阎冯出洋之声浪转微”，这种政治舆论空气的变化则暗示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大公报》通过话中有话，言外之意来报道这则新闻的技巧，比徐铸成回忆的更为巧妙和高明。因为，徐铸成回忆大体属实，而且他的自述更能显示出记者对这种隐晦手法报道重大内幕新闻的认识和态度，所以本文在正文中依然以使用徐氏说法为主。
- [6] 但南京政府新科权要变相贿赂记者的情况依然存在。可参见金雄白。记者生涯五十年（下）[M]。台湾跃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第13-14页。
- [7] 相关详细讨论可参见，钱穆。阳明学述要[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
- [8] 类似的讨论可参见，[美]凯博文著，刘嘉雯、鲁宓译，余德慧审阅。道德的重量：不安年代中的希望与救赎[M]。台北：台湾心灵工坊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第60-61页。

参考文献：

- [1] 黄远生。忏悔录[A]。载陈协选编，黄远生著。游民政治[C]。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
- [2] 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A]。载肖东发，邓绍根编。邵飘萍新闻学论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3] 胡政之。新闻记者最需要有责任心[A]。载王文彬编。报人之路[C]。上海：三江书店，1938。
- [4] 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 [5] 任白涛。应用新闻学[M]。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三联书店复制版，2014。
- [6] 陈博生。做新闻记者的几个原则[A]。载王文彬编。报人之路[C]。上海：三江书店，1938。
- [7] 顾执中。报人生涯：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自述[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 [8] 张季鸾。新闻记者根本的根本[A]。载王文彬编。报人之路[C]。上海：三江书店，1938。
- [9] 戈公振。新闻教育之目的[A]。载龙伟等编。民国新闻教育史料选辑[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10] 蒋荫恩。美国的新闻道德规律[J]。报学季刊，1935(3)，第35-55页。
- [11] [美]利昂·纳尔逊·弗林特著，萧严译，李青藜、展江校。报纸的良知新闻事业的原则和问题案例讲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 [12] 邵飘萍。新闻学总论[A]。载肖东发，邓绍根编。邵飘萍新闻学论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13] 萧乾。随笔三则[A]。载张昌华编，萧乾编。往事三瞥[C]。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
- [14] 方蒙。范长江传[M]。北京：中国新闻出版出版社，1989。
- [15] 范长江。塞上行[A]。载沈谱编，范长江著。范长江文集（上）[C]。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 [16] 金雄白。记者生涯五十年（上）[M]。台北：台湾跃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
- [17] 宋北风。邵飘萍采访新闻轶事[A]。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化史料（第4辑）[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3。
- [18] 董显光著，曾虚白译。董显光自传[M]。台北：台北独立作家出版社，2014。
- [19] 王文彬。采访讲话[M]。上海：三江书店，1938。
- [20]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 [21] 陶菊隐。记者生活30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M]。北京：中华书局，2005。
- [22] 汤尔和。实际应用新闻学·汤序[A]。载肖东发，邓绍根编。邵飘萍新闻学论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23] 范长江。“千里江陵一日还”[A]。载沈谱编，范长江著。范长江文集（上）[C]。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 [24] 王芸生。努力做一个有灵魂的新闻记者[A]。载王文彬编。报人之路[C]。上海：三江书店，1938。
- [25] 都。首都新闻记者被辱事件[N]。申报，1933-9-17。
- [26] 海士。首都记者与天津益世报之笔墨官司[J]。时时周报，1930(7)。
- [27] 林白水。粪窖中之别有天地[N]。社会日报，1926-7-28。
- [28] 林白水。无处不糟[N]。社会日报，1926-7-22。
- [29] 方汉奇，林溪声。林白水：以身殉报的报界先驱[J]。新闻与写作，2006(9)，第30-32页。

- [30] 陈学昭. 记者的道德[N]. 记者周报, 1930-6-8, 第13页.
- [31] 赵效沂. 报坛沉浮四十五年[M]. 台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1.
- [32] 京报[N], 1921-1-6.
- [33] 张继斋. 三十年中之二十年[A]. 新闻报馆编. 《新闻报》三十年纪念[C]. 上海:上海新闻报馆, 1923.
- [34] 林语堂著, 王海, 何洪亮主译, 王海, 刘家林校. 中国新闻舆论史[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 [35] 黄远生. 少年中国之自白[A]. 载陈协选编, 黄远生著. 游民政治[C]. 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3.
- [36] 徐铸成. 新闻丛谈(增编本)[M]. 北京:三联书店, 2011.
- [37] 郭步陶编著. 本国新闻事业[M]. 上海:申报馆, 1936.
- [38] 袁殊. 记者道[M]. 上海:上海群力书店, 1936.
- [39] 邵飘萍. 北京特别通信(五七)[A]. 载方汉奇主编. 邵飘萍选集(上册)[C].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
- [40] 邵飘萍. 北京特别通信(五三)[A]. 载方汉奇主编. 邵飘萍选集(上册)[C].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
- [41] 邵飘萍. 北京特别通信(八〇)[A]. 载方汉奇主编. 邵飘萍选集(上册)[C].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
- [42] 邵飘萍. 北京特别通信(八四)[A]. 载方汉奇主编. 邵飘萍选集(上册)[C].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
- [43] 邵飘萍. 北京特别通信(九)[A]. 载方汉奇主编. 邵飘萍选集(上册)[C].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
- [44] 罗彬. 试析新闻道德规范中的三个道德难题[J]. 国际新闻界, 2009(6), 第59-62页.
- [45] 邵飘萍. 北京特别通信(七八)[A]. 载方汉奇主编. 邵飘萍选集(上册)[C].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
- [46] 芳. 新闻道德谈[N]. 福尔摩斯, 1937-6-13.
- [47] 鲁莽. 夜生活——二十年报纸生涯甘苦录[M]. 重庆:独立出版社, 1943.
- [48] 林熙. 李思浩的政治生涯[J]. 传记文学, 1997(1), 第105页.
- [49] 王新命. 走过民国初年的新闻史:老报人王新命回忆录[M]. 台北:台北独立作家出版社, 2016.
- [50] 林慰君. 林白水传[M]. 台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69.
- [51] 徐铸成. 报海旧闻(修订版)[M]. 北京:三联书店, 2010.
- [52] 曹聚仁. 听涛室人物谭[M]. 北京:三联书店, 2007.
- [53] 顾执中. 战斗中的新闻记者[M]. 北京:新华出版社, 1985.
- [54] 张竹平. 发刊词[J]. 报学季刊, 1934(创刊号), 第1-2页.
- [55] 唐德刚. 段祺瑞政权[M]. 台北:台湾远流出版社, 2012.
- [56] 徐铸成. 徐铸成同志的思想检查[A]. 载徐铸成著. 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C]. 北京:三联书店, 2012.

Internet use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doctor trust. This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after dealing with endogenous issues and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2) This negative effect is more obvious observed in groups without medical experience; (3) Internet use can reduce public trust on doctors by strengthening the public's perception of inequality in society. This research helps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et use and doctors trust, and shows the positive role of strengthening public interaction with doctors and enhancing social justice to alleviate the crisis of doctor trust, which has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departments to make related policies.

[Keywords] doctor trust; internet use; medical experience; social justice

35 On the Dilemma and Deliverance of Journalistic Ethics in Republican China

· *LU Peng-cheng*

[Abstract] Inheriting from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Ethics, embracing the western modern journalism ethics, a character-centered journalism ethics was born in Republican China. This sort of ethics established high and rigorous moral standards for the journalists, and furthermore, valued the journalists' character so highly that it was used to assess journalists'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performance. Struggling with the moral dilemmas in professional performance, journalists had a set of ideal codes of ethics, but lacked any practical tools to resolve these moral problems, which made them suffer anxiety and agony.

[Keywords] journalism ethics; character-centered journalism ethics; famous journalists

51 The Rhetoric of Environmental News Discourse: A Triangular Comparison Based on China's Environmental Bulletin

· *WANG Chun, ZHANG Yu-chuan*

[Abstract] It has been agreed that traditional media and new media have different reporting frameworks on environmental issues, but more important is which is closer to the real environment conditions. China's Environment Bulletin is a public report reflecting China's annual state of the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Nationa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Network. It is relatively close to the real state of the environment. This paper